

一、研究背景

目前，中国已经步入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收入区间，自 1978 年以来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正在弱化，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着诸如劳动力价格上升、能源和环境瓶颈日益凸显、资产泡沫化、投资效率低下和出口受阻等一系列现实约束。在这一背景下，Krugman (1994)和 Young (2003)等针对东亚和中国经济的论断在学术界重新引起关注。随着国内外关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讨论的展开，一个重要且敏感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内外学者针对“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展开了研究。

二、研究思路与基本内容

该文首先通过对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轨迹的描述考察“中等收入陷阱”是否为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然后在经济增长的研究框架下进行实证研究，寻找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动力因素；紧接着该文在分工与交易费用的框架内对“中等收入陷阱”发生机理进行理论分析，研究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的困难所在；最后对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进行评估，讨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潜在动力因素。

该文以人均 GDP 的对数为被解释变量，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对外开放度、制度和技术进步为核心解释变量构造了回归方程，并采用差分 GMM 的方法对方程进行了回归。按照世界银行的收入划分标准，对低收入水平、中低收入水平、中高收入水平和高收入水平的国家进行分析，研究了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经济增长动力，揭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机理。

三、主要结论

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是不同的。一个在低收入阶段和中低收入阶段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在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以后，如果不能适时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就会面临被“中等收入陷阱”锁定的风险。实证研究表明，制度和原创性技术进步是中等收入国家可持续增长的关键要素，发展中国家要想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改善政府治理，鼓励创新。

四、汇报点评

该文从制度和原创性技术进步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机理。对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实施简政放权，进行技术创新从而实现增长动力转型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支持。但是该文在计量分析对文章主旨的说明略显不足，对高收入阶段的划分主要采用了 2010 年的人均 GDP 水平，但是这些国家在更早时期处于中高收入阶段和中低收入阶段，然而该文在计量分析时仍按照高收入阶段进行分析。文章应该在计量分析前对不同收入阶段进行更严格的划分。

